

# 伊拉克犹太移民运动多维历史透视<sup>\*</sup>

● 杨玉龙 李琦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伊拉克犹太人是米兹拉希犹太的分支,在20世纪20-30年代英国统治伊拉克时期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20世纪40年代伊拉克政府实施的对犹太民族政策及实践使伊拉克犹太人社会地位迅速滑落,生存环境日益艰难。在以色列人口接纳战略的影响下犹太人被迫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关键词:** 伊拉克;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DOI: 10.3969/j.issn.1009-4458.2015.05.024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58(2015)05-0112-05

伊拉克犹太人属于米兹拉希犹太(Mizrahi Jews)的分支,是以色列国犹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40-50年代在伊拉克发生了一场犹太移民运动,绝大多数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关于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目前国内学者较多地关注欧洲犹太人在“二战”后的移民运动,对于东方犹太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们移民以色列以后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方面,对于阿拉伯国家犹太移民运动的起源、过程及深层原因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选择阿拉伯犹太人移民浪潮中的伊拉克犹太移民运动作为个案,通过对这场移民运动历史背景的分析,详细考察其历史演进的各个阶段,解析该过程中的3个主要行为体在移民运动中的角色、地位和影响,从深层的历史逻辑把握这场具有独特意义的移民运动。

## 一、20世纪20-30年代伊拉克犹太人的社会地位

伊拉克犹太人史可追溯至2700年前的巴比伦犹太社团,根据其历史演变线索,1917年前的伊拉克犹太史可划分为两个时段。第一时段从公元

前586年“巴比伦之囚”到13世纪中叶,以巴比伦犹太社团作为大流散时期中世纪犹太学术中心和宗教文化繁荣为主要特征。第二时段从14世纪中叶至“一战”期间英国占领伊拉克。在奥斯曼时代,波尔特(即中央政府)实施民族内部事务自治的米列特制,犹太人获得了社团内部事务自治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与此同时,伊拉克犹太人的主要聚居区巴格达城的犹太居民数量在奥斯曼统治末期日渐增多,到1900年增至50000人,占巴格达全城人口的1/4;在巴士拉和摩苏尔等大城市也有中小规模的犹太社团存在。1914年“一战”爆发,奥斯曼帝国对协约国宣战,英国军队旋即登陆巴士拉,1917年占领巴格达,奥斯曼帝国在伊拉克地区的统治瓦解。<sup>[1][349]</sup>

英国占领伊拉克标志着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大转变。在奥斯曼统治时期,尽管米列特制使犹太人获得了内部自治和宗教自由,但迪米人(Dhimmi)在政治经济领域权利极其有限,大部分犹太人处于贫穷和落后的状态。英国政府在伊拉克的殖民统治贯之以英国传统的殖民策略,实施分而治之和依赖少数民族的政策来打压主体民族,在伊拉克即依靠北方库尔德人、西部边疆的亚述人、以

<sup>\*</sup> 收稿日期:2015-04-05  
作者简介:杨玉龙(1989-),男,陕西省渭南市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东史。

及大城市中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以及少量城市逊尼派贵族、农村什叶派谢赫来维系自己的政权。在此统治政策下犹太人迎来了自由解放的黄金时期。在人口方面,1919年伊拉克犹太人大约87000人,至1940年代末约135000人,人口数量稳步增长;<sup>[1][4-5]</sup>在政治方面得到伊拉克政府的重用,犹太人在国会中拥有相应人口比例的议员,可以在政府部门中任职,犹太人甚至在伊拉克的财政部门长期担任部长等高官;在经济方面,犹太人可以自由经营各种行业,从事银行业、对外贸易等部门,在伊拉克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会文化层面犹太人大力兴办教育行业,出版各种新闻报刊,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

1932年伊拉克获得法理上的独立,阿拉伯人接管政府后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开始逆向发展,所谓的黄金时期戛然而止。从20世纪30年代起伊拉克国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勃然兴起,社会中存在一股强烈的反英反殖情绪,犹太人被新一代接受教育的中产阶层逊尼派穆斯林视为具有亲英立场和代理人身份的殖民主义产物,是英国对伊拉克阿拉伯人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支柱之一。<sup>[2][5]</sup>同时,纳粹政府在伊拉克国内通过其大使馆和新闻媒体进行反英反犹宣传,以及30年代后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激烈冲突的负面影响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犹太社团的处境日益困难,犹太人遭受到社会不公正的歧视和限制,其未来面临着双向选择。社团中的一派主张融入伊拉克社会,成为具有犹太教信仰的伊拉克阿拉伯人;另一派则主张移民以色列,回归所谓“应许之地”。但在30年代和4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出于对伊拉克固有的浓厚情感、经济考虑和其他原因,绝大部分犹太人并不认同回归的西向选择,依然坚持伊拉克国家认同。

## 二、20世纪40-50年代伊拉克犹太移民运动的演进

根据伊拉克犹太移民运动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特点和标志性事件,可划分为3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自1941年6月1日“法胡德事件”爆发至1948年,这是伊拉克犹太移民运动的起始阶段。“法胡德事件”与“二战”时期伊拉克的战略地位、国内政治斗争和纳粹德国反犹主义宣传及

1941年5-6月的英伊战争密切相关,英伊战争是该事件的导火索。1941年欧洲战场形势对同盟国极为不利,北非战场亦不容乐观。当时的伊拉克是英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石油供应地,也是英联邦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属印度军队的运输通道,战略地位异常重要。<sup>[3][60]</sup>在此时代背景下,伊拉克国内亲英派和亲德派势力正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1941年初战争倒向轴心国的格局使亲德派决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卜杜拉摄政王,向英国开战。1941年4月1日,政变在巴格达成功,阿卜杜拉流亡国外,盖拉尼建立国防政府,旋即发动对英国的战争。伊拉克军队大举进攻英军基地哈巴尼亚,5月底伊军战败,盖拉尼逃往伊朗,巴格达城陷入权力真空局面。<sup>[3][61-61]</sup>战争失败使受到严重挫伤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士兵以及反犹倾向的民众将犹太人作为发泄对象。<sup>[1][350]</sup>6月1日,时值犹太教节庆五旬节,一名前往伊拉克王宫会见摄政王阿卜杜拉的巴格达犹太代表在路上被杀,之后巴格达全城掀起屠杀犹太人、焚烧犹太人房屋及抢劫其商店的暴乱,事态由于巴格达的无政府状态失去控制,直到6月2日才逐渐平息。据不完全统计持续两天的屠杀共有180名犹太人被杀,数百人受伤,大量房屋和商店被焚烧。“法胡德事件”对伊拉克犹太社团产生了多重影响。首先,该事件直接导致少量犹太人基于安全考虑而选择移民。其次,该事件激励了伊拉克境内各种锡安主义运动。再次,对伊拉克犹太人造成了国家认同观念的转向和心理上的创伤,导致伊拉克犹太人对阿拉伯人产生一种隔阂感,两个群体之间的信任和联系遭到破坏。

第二阶段从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至1950年3月,这是伊拉克犹太移民运动的发展阶段。从中东地区形势看,1947年“联大”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引发阿拉伯世界的愤怒和抗拒,阿拉伯世界的犹太社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伊拉克犹太人也未能幸免;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及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将犹太社团推向了伊拉克社会的对立面。从伊拉克国内的政局考察,一方面伊拉克政府与英国签署《朴茨茅斯条约》而被国内左右翼政客诟病,政局不稳,民众抗议浪潮持续不断;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在战后走势疲软,至1948年已陷入经济危机中,中东战争爆发又导致连接海法的输油管道被切断,石油出口大受影响。

在此国内外形势下,伊拉克政府于1948年7月中旬通过宪法修正案,宣扬锡安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可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通过立法形式获得了惩处国内有嫌疑犹太人的合法依据,并通过实施《紧急状态法》对伊拉克犹太人实施压迫政策。人身自由方面,从1948年5月开始伊拉克政府禁止犹太人出国旅行,除非缴纳2000第纳尔保证金且必须有国防部的批准,以此杜绝犹太人出逃;同时通过各种理由对与锡安主义有嫌疑的犹太人肆意拘捕审问,据以色列外交部估计,仅1948年5月到8月就有300名犹太人被伊拉克政府以与锡安主义有联系的名义而拘捕。<sup>[2][162]</sup>从政府职位方面看,伊拉克政府从行政、司法、立法部门陆续辞退和解雇政府中的犹太人,包括犹太人长期任职的财政部等部门,公务员系统中的犹太人也都被开除。从金融贸易、就业、教育方面看,犹太商人和银行家经营贸易、银行业务受到严格限制,贸易许可证时常被吊销,犹太商人经商还被收取高额税款,犹太银行不得进行对外交易,以防止其转移资本,犹太人在就业时困难重重,很难找到工作;犹太学生也被禁止接受高等教育。<sup>[2][163]</sup>

伊拉克政府对犹太人压迫政策的高潮以“沙菲克·阿戴斯事件”为标志。沙菲克·阿戴斯是巴士拉有名的犹太大商人,与伊拉克政府的高官显贵甚至是摄政王阿卜杜拉都有密切的来往。1948年9月23日他被伊拉克法庭以私运武器给以色列和支持伊拉克共产党的罪名判处死刑,全部家产被没收,并在巴士拉市内广场施以公开的绞刑。该事件给予整个伊拉克犹太社团极大的震动,伊拉克犹太人普遍认为有权有势的沙菲克·阿戴斯既然可以被政府以锡安主义的借口而处决,那么普通犹太人在不公正的司法体系下无任何被保护的安全。<sup>[4][90]</sup>尽管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政府逐步解除了对犹太人的压迫政策,基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以恢复,但是歧视和限制依然未有太大改观。<sup>[2][169]</sup>

第三阶段从1950年3月伊拉克政府颁布《国籍放弃法》到1952年初以色列政府完成“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这是伊拉克犹太移民运动的高潮阶段。自1941年“法胡德大屠杀”以来伊拉克犹太人开始小规模地移民海外,这种小规模移民趋势一直持续到1948年。随着伊拉克政府对本国

犹太人迫害政策的实施,移民数量开始激增,到1950年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方式的移民数量达到每月1000人。<sup>[2]p.205</sup>伊拉克政府1951年3月颁布《国籍放弃法》以后更是掀起注册移民的狂潮,至1952年绝大部分伊拉克犹太人移民前往以色列。根据1950年至1952年期间移民浪潮表现出的阶段性特点,可将其划分为两个子时段。

第一个子时段从1950年3月至1951年3月,这是伊拉克犹太移民浪潮的启动时段。在这1年中由于政府颁布《国籍放弃法》给予的移民自由,大部分犹太人签署了放弃伊拉克国籍以换取移民的协议。《国籍放弃法》是由伊拉克内政部部长萨利赫·贾巴尔于1950年3月2日向伊拉克议会正式提交的法案,其目的主要在于将非法的犹太移民浪潮合法化,消灭国内的锡安主义运动,缓解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政治压力和舆论谴责。其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伊拉克犹太人可以在1年以内通过合法方式向内政部提交移民申请,并放弃自己的伊拉克国籍;第二,所有通过非法方式移民国外的犹太人将被剥夺伊拉克国籍;第三,自该法案生效之日起非法离开伊拉克的犹太人2个月以内返回可以不被剥夺伊拉克国籍。<sup>[2][198-199]</sup>该法案颁布后,1年内大约86000人注册登记放弃国籍移民以色列,但伊拉克犹太人对于移民依然犹豫不决,同时以色列政府也因为欧洲犹太人如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大量移民而不堪重负,试图将伊拉克犹太人的回归再推迟几年,因此实际移民的人数只有2万多人。<sup>[2][205]</sup>第二个子时段从1951年3月至1952年,由于伊拉克政府实施强制驱逐政策,颁布“财产冻结法令”,在1年内大约10万犹太人通过以色列政府实施的“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移民以色列,至此犹太移民运动基本完成,未移民者大约只有数千人,随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剩余的犹太人政府的压迫政策下也纷纷移民或逃亡,至70年代伊拉克犹太社团人数不足千人,至2013年大约只剩下5人。

### 三、伊拉克犹太移民运动的历史解析

伊拉克犹太社团在短短10年间迅速消亡的历史过程是令人震惊的,其结果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历史文化积淀最为深厚之一的犹太社团不复存在。在解析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

时,必须多层面、多角度地把握关键性的行为体,因此下文将从伊拉克政府、以色列政府和伊拉克犹太社团为视角解析这三个行为体在该历史现象形成的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影响。

第一,伊拉克政府的对犹民族政策及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伊拉克犹太移民运动的直接推动力和主要原因。20世纪20、30年代是伊拉克犹太人的黄金时代,但40年代伊拉克政府的对犹民族政策开始转为歧视限制,到1948年开始实施压迫政策,1950年升级为强制驱逐政策。从表层的历史事件和现象考察,伊拉克政府的对犹民族政策无疑是犹太人移民的直接推动力,特别是伊拉克政府颁布的《国籍放弃法》和“财产冻结法令”,给予了伊拉克犹太社团致命一击。从深层的社会思潮领域解析,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伊拉克社会的重新整合和建构所强调的阿拉伯民族认同是犹太移民运动的深层原因。伊拉克政府在阿拉伯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上,其对犹民族政策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是“二战”以来阿拉伯世界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主流思潮;是阿拉伯民族对未来前途进行的探索,是阿拉伯民族借以维护其民族权益、发展自身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工具。<sup>[5]</sup>除了来自中东国际政治领域的阿以冲突、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等大事件对伊拉克外部的冲击和影响之外,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其政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一世去世以后,逊尼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军队系统中势力逐渐壮大。由于伊拉克犹太人在英国直接控制伊拉克时期(1917-1932)获得的优越待遇和英国政府的良好关系,被伊拉克阿拉伯人视为亲西方的“第五纵队”,再加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断移民巴勒斯坦地区造成的阿犹冲突,使得伊拉克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浓烈的反犹情绪,“法胡德大屠杀”就是这种社会情绪在国家政治失控时期导致的权力真空所引发的社会暴力事件。“二战”结束后殖民主义体系在中东土崩瓦解,伊拉克政府开始强力主导以阿拉伯民族为核心的国家建构,反殖民主义成为了重要的舆论宣传和动员手段。在此国内历史条件下,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制定限制、迫害政策,以缓解自身的压力,平息公众对以色列建国、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战败民族耻辱的愤怒,而伊拉克犹太人因此成为了“替罪羊”。早在

1949年,伊拉克政府曾经制定过一份人口交换计划,以伊拉克犹太人交换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试图一次性地解决伊拉克犹太社团。<sup>[6][613]</sup>因此,伊拉克政府在伊拉克犹太社团消亡的历史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是该历史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

第二,以色列政府的人口接纳战略及其背后的锡安主义意识形态是犹太移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是该历史现象形成中主要的外部因素。早在以色列建国前,以本·古里安为首的锡安主义者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表示要利用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建设“犹太民族之家”(即巴勒斯坦),实施所谓“百万人口计划”,其中就包括阿拉伯国家的东方犹太人。<sup>[7]</sup>该战略在比特莫尔会议上得到正式确认;1950年以色列政府颁布《回归法》,将居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称之为“流散犹太人”,将移民以色列表述为“回归祖国”,人口接纳战略正式法律化、制度化,<sup>[8][252]</sup>使之成为以色列建国后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通过派遣锡安主义者在伊拉克进行组织活动和回归宣传,形成了两个主要的伊拉克锡安主义组织,这两个组织对后来伊拉克犹太人的移民有重要的动员作用。1950年伊拉克政府颁布的《国籍放弃法》使得以色列政府不得不提前实施对伊拉克犹太社团的接纳战略,同年以色列动用大量飞机实施了所谓“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完成对10万伊拉克犹太人的移民接纳工作。显而易见,支配建国前的犹太代办处和建国后以色列政府实施所谓人口接纳战略的主要思想来源于锡安主义意识形态(即犹太复国主义)。就锡安主义的实质而言学者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它是一种流散民族主义,<sup>[6][611]</sup>其主流派别政治锡安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将散居在全世界各地信奉犹太教和各种文化背景下的族群吸引到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现代犹太民族国家,这种政治思潮及实践与古老的犹太宗教文化密不可分,是其思想的主要源泉。在此支配下的以色列国致力于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动员回国内,其现实的政治目的符合当时中东国际政治格局下的工具理性行为。本·古里安在建国后深知以色列国的脆弱性主要在于人口太少,尽管通过美国的支持打赢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但在四周阿拉伯国家时刻可能出兵入侵的不利地缘条件下,争取犹太移民来补充是以色列国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这是本·古里安人口平衡战略的深层

逻辑。因此,以色列在人口接纳战略的指导下通过锡安主义组织在伊拉克犹太社团中实施的政治动员和舆论宣传,最终成功地推动大量犹太人决心移民,对这场移民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外部推动作用。

第三,从伊拉克犹太社团内部分析:社会地位滑落、国家认同危机、安全感缺失及锡安主义组织的宣传和动员是推动犹太人选择移民放弃其伊拉克人身份的内在因素。首先,1948年伊拉克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排挤、歧视和限制犹太人,使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一年后颁布的“财产冻结法令”使尚未移民的大多数伊拉克犹太人丧失了几乎全部财产,被迫移民以色列。<sup>[2][205-206]</sup>其次,针对犹太人的多次恐怖袭击和各种压迫政策,使大多数伊拉克犹太人丧失了国家认同感,导致他们放弃融入伊拉克社会的选择,转而西向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宗教认同感激发了回归“应许之地”的信心和期待。再次,1950-1951年巴格达炸弹事件和伊拉克阿拉伯人的反犹情绪造成大多数犹太人安全感的缺失,特别是“法胡德事件”和“沙菲克·阿戴斯事件”给伊拉克犹太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最后,伊拉克锡安主义组织的政治动员和舆论宣传是积极推动犹太人移民的一大动力。在以色列政府实施移民行动之前,这些组织的成员即发表公开号召移民的宣言,号召犹太人离开巴比伦尼亚,回归迦南之地,移民宣言发表后至少有数以千计的犹太人纷纷响应,其影响不可忽视。<sup>[2][202-203]</sup>

综上所述,20世纪40-50年代伊拉克政府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对犹太民族政策及其实践是伊拉克犹太移民运动的直接推动力

和主要原因;以色列政府在锡安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实施的人口接纳战略及人口移民行动是其主要外部因素和外来推动者;犹太社团社会地位滑落、国家认同危机、安全感缺失及锡安主义组织的宣传动员是推动其最终选择移民的内在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互相联系,使伊拉克犹太社团最后走向历史的终结。□

#### 参考文献:

- [1]Reeva Spector Simon, Michael Menachem Laskier, Sara Reguer Editors: *The Jew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Modern Time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2]Ether Meir - Glitzenstein: *Zionism in the Arab Country: Jews in Iraq in the 1940s* [M], London: Taylor Francis Group, 2004.
- [3]Jeffrey Herf: *Nazi Propoganda for the Arab World* [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4]Orit Bashkin: *New Babylonians: A History of Jews in Modern Iraq* [M],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5]王铁铮. 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5.
- [6]Yehouda shenhav: *The Jews of Iraq, Zionist Ideology, and the Property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s of 194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J], Vol. 31, No. 4( Nov. 1999), pp. 605 - 630.
- [7]Shenhav Yehouda: *The Arab Jews: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Nationalism, Religion, and Ethnicity* [M],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1.
- [8]张倩红. 以色列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252.

责任编辑: 赵殿武